

COMPARATIVE NARRATIVE POETIC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WESTERN CLASSICAL NARRATOLOGY AND
CHINESE NARRATIVE THOUGHT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中西叙事诗学比较研究

以西方经典叙事学和中国明清叙事思想为对象

罗怀宇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本研究课题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名称为“中西叙事诗学比较研究：以西方经典叙事学和中国明清叙事思想为对象”；项目批准号为16YJC752015。

COMPARATIVE NARRATIVE POETIC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WESTERN CLASSICAL NARRATOLOGY AND
CHINESE NARRATIVE THOUGHT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中西叙事诗学比较研究

以西方经典叙事学和中国明清叙事思想为对象

罗怀宇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西叙事诗学比较研究：以西方经典叙事学和中国
明清叙事思想为对象 / 罗怀宇著 . — 广州：世界图书
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6.11
ISBN 978-7-5192-2054-9

I . ①中… II . ①罗… III . ①叙事诗—比较诗学—中国、
西方国家 IV . ① I207.22 ② 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2497 号

书 名 中西叙事诗学比较研究：以西方经典叙事学和中国明清叙事思想为对象
ZHONGXI XUSHI SHIXUE BIJIAO YANJIU: YI XIFANG JINGDIAN
XUSHIXUE HE ZHONGGUO MINGQING XUSHI SIXIANG WEI DUIXIANG

著 者 罗怀宇

责任编辑 宋 焱

装帧设计 黑眼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 编 510300

电 话 020-84460408

网 址 [http:// www.gdst.com.cn](http://www.gdst.com.cn)

邮 箱 sjxsch@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192-2054-9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出版社联系)

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叙事学在中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经过学者们的辛勤努力，叙事理论的译介、研究，结合理论的文本分析，使国内叙事学研究庶几与西方接轨。叙事学进入很多大学的课堂，中国学会的成立，大大促进了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叙事学的“西学东渐”已经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步，尽管对于它的进一步研究是一个没有休止的事情。

在叙事学的引入繁荣了我国学术研究，赋予了我们新的研究方法，令我们欢欣的时候，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一是对于叙事学是否也需要做批判式的借鉴，使其更适合中国的文学土壤，进而化为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的血肉；二是怎样发掘中国本土的叙事理论，把它放在与西方理论平等的位置上，通过比较研究，去粗取精，使之成为世界文学理论的一部分，与西方叙事理论交相辉映。

在全球化的时代，整个人类构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而人类知识也越来越趋向于一种“知识统一体”，即各民族的知识既有其独特性，各自独立，又互相融合，相辅相成，形成一个不容割裂的统一整体。因此，在学术研究中便不可只有单纯的“拿来主义”，更要有“输出主义”。在“拿来”与“输出”的过程中，比较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通过比较，我们才有鉴别，才知道什么该“拿来”，什么该“输出”。既不全盘拿来，也不全盘拒绝；既有民族文化的自信，也有对民族文化的清醒认识。在如何认识和对待西方叙事理论和中国叙事理论的问题上，我们亦应取如是态度。

西方叙事理论条分缕析，体系缜密。中国叙事理论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双重误读”和“强制阐释”，并在实践中取长补短，就需要进行比较研究。比较首先需要在理论层面上正本清源、辨明同异。在中西叙事理论的比较方面，已有成果多见于研究文献的整理和译介、研究思路和模式的探讨以及叙事

宏观层面的比较，而按照叙事范畴和概念组织的系统性的具体比较尚不多见。当前，西方叙事学的发展呈现出如下特征：一方面，为了回应新历史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理论的挑战，经典叙事学吸纳了其他学科的特点，较之以前更着重文本外的因素的研究，从而产生了后经典叙事学；另一方面，多学科融合的特点虽然具有积极意义，但如果过度脱离经典叙事学的基础，则有可能弱化叙事学的学科属性。比较而言，中国叙事思想可以提供一些非常不同于西方叙事理论的新鲜经验，其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及蕴含其中的丰富的西方叙事学思想使其与西方叙事学产生很强的对话性。因而，在经典叙事学与明清叙事思想之间展开具体、系统而深入的比较研究是非常有学术价值的，也有利于促进中国文学和中国叙事思想更好地为世界所理解和接受，为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做出贡献。在这个意义上，罗怀宇博士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他将西方经典叙事学和中国明清叙事思想置于比较视野之下进行研究，这是一次颇有勇气的探索。该书对研究领域的熟谙，对比较研究价值取向的探讨，对作者、结构等概念所做的深入细致的比较，对“文心”等中国传统文论重要概念的理论的梳理与阐释，无不体现了作者的厚实的学术积累和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书中的精彩论述可见作者思想的敏锐和表达的圆熟。

作者罗怀宇是我多年的学生。他为人朴实、谦逊，既有思想，又重性情，既有国际视野，又具民族情怀，殊为难得。在我认识的与他同辈的学人中，他的英文和中文都是出类拔萃的。2006年秋天，当时尚在外交学院攻读硕士的他带着文章和一些译作来北语看我。我也愉快地赠书为勉，同时希望他多读理论与文本的经典之作、多思考文学文化问题。此后他便开始通过邮件与我分享他的学习心得体会。201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录取为我的博士研究生，学习西方文论尤其是叙事理论，同时研读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叙事思想，我希望他能够撰写中西叙事理论比较方面的博士论文。在北语读了2年后，我推荐他前往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文学院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他顺利地用英文撰写了博士论文。2014年7月和9月，他分别被授予北京语言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和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分别荣获“北京语言大学校级优秀博士论文”和麦考瑞大学“高等学历研究奖”。

如今，怀宇在事业、家庭、教学、科研等方面都已步入正轨。他睿智、勤学、善思，学术功底扎实，我坚信他在学术研究上会取得更大的成就。还有什么比看到学生的

成长更让老师感到欣慰的呢！值此书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出版之际，欣然以数语为序。

宁一中
2016年11月
北京语言大学

前 言

古人有“三不朽”之说，曰：立德、立功、立言。立德，乃君子毕生追求，不可一日自足；立功，有赖命运造化，不可力强而致；唯有立言，是学人肩负的对于知识、国族和时代当仁不让的责任，不可不以敬畏之心事之。

本书作者自认才疏学浅，遑论立“一家之言”。然而，在写作拙著的过程中，却也不曾暂忘这样一份责任与敬畏。囿于自身学术水平，拙著中浅陋、失当乃至谬误之处恐怕也在所难免，诚望学界的前辈与同侪多多包涵并不吝指教。另一方面，如若拙著中的一些观点和阐述能在一定程度上有资借鉴，或者带给读者以某种启发或共鸣，我必将引为大幸，并会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再接再厉、精益求精。

西方文论与中国诗学好似两座并峙的高峰。作为双方重要组成部分的叙事理论自不例外。一方面，中西方在文艺美学和哲学观上的差异必然反映为各自在叙事传统、手法、旨趣以及理论话语上的异趣或者异质因子；而另一方面，叙事在其社会、文化本原上的共性必然又决定双方存在一定甚至很大程度上的通融性。深入全面地认识二者之间的同一性和异质性，并对其可能的原因加以剖析，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看待中西文学间的历史及现实互动，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向西方推介历史上的中国文学和文论，促进当代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借用当下流行的表达，做好这项工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听懂世界的故事”，并向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

在中国传统叙事思想与西方叙事学的比较研究方面，中国的文学研究学者和西方的汉学家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然而客观地说，既有的研究多集中在对重要理论文献的双向译介或者高屋建瓴式的总体比较，具体入微的系统性比较则在很大程度上付之阙如。拙著选取跻身西方文论正典的经典叙事学和作为中国原生叙事思想集大成者的明清叙事思想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就是为了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具体比较明晰双方一些重要的理论事实，揭示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叙事学信息和文化密码，从而希望达致中西理论学说互为映照（巴赫金称之为“*interillumination*”；钱钟书先生谓之“*mutual illumination*”）的奇妙效果，丰富叙事学作为一门跨越中西

的一般性学科的理论内涵。

拙著付梓之际，我心中充满着无尽的感恩。首先，我无比感念自己的授业恩师宁一中教授。恩师博雅的学识风度、正派的学者风格和“润物细无声”的育人艺术让我在四年的博士学业中受用无穷，也将化作我在学术道路上砥砺前行的动力。恩师和师母段江丽教授对于门生言传身教、关怀备至。他们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和写作以及后来的出国留学申请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们家中数不清次数的快乐的聚会成为学生们共同的美好回忆。我也要感谢我在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文化研究系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时的导师 Nick Mansfield 教授，正是他的鼓励和帮助使我能够高效率地完成英文博士论文。我要特别感谢曾经惠赐重要参考文献的申丹教授和在我研究不同阶段给予过批评、指点与帮助的周小仪教授、刘世生教授、陈永国教授、封宗信教授、金莉教授、马海良教授、王丽亚教授、谭惠娟教授、王雅华教授、John Pier 教授和 Wolf Schmid 教授，等等。我还要衷心地感谢单位领导甫玉龙教授、朱晓苑教授等对我读博和出国留学的支持和大力帮助，感谢外语系领导和同事们长期以来对我的关心与支持。

拙著能如期顺利地出版离不开责任编辑宋焱女士的督促与辛勤付出，在此谨致上我最诚挚的谢意。

回望过去六年多的时间，为了追求学问，我义无反顾地寄身篇籍翰墨，对于家人特别是善良贤淑的妻子和日渐年迈的高堂负有深深的歉疚。让我们感到无比欣喜的是，去年十一月份我们迎来了健康、活泼、可爱的女儿，生活于我们而言翻开了全新的一页！拙著也是我希望送给他们的一个礼物。

年过而立无奈，世事白云苍狗。抚今追昔感怀，所幸初心犹在。我不禁想起2011年出国留学前辞别恩师的一首小诗：

杏坛究竟定有数，重回老君炼丹炉。
真火淬尽障与痴，灵药一洗眼前雾。
穷经不必待皓首，悟道何妨重洋渡。
大道常在大寂中，无常当与有常住。

是为记。

罗怀宇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北京·左安门值房

目 录

导 论 中西叙事诗学比较：现状与展望	001
一、借异镜与磨己镜	005
二、亮交相辉映之灯	009
三、视域融合，抑或不同而和？	013
四、未来研究展望	015
第一章 比较对象概览	017
一、西方经典叙事学	018
二、中国明清叙事思想	021
三、时间倒错与可比性的问题	023
上 篇 重要叙事范畴及概念之比较	
第二章 作者（权威）	026
一、方可方不可的作者	026
二、对作者（权威）的推求	027
三、隐含作者及其理论困境	030
四、作者（权威）的文本分析	035
第三章 结 构	040
一、时间性	042
二、空间性	048
三、整一性	059

第四章 故事	063
一、时序、时距与频率	064
二、核心事件与附属事件	075
三、悬念与惊奇	076
四、人物	079
第五章 话语	083
一、视角与聚焦	083
二、言语表现	089
三、人物塑造	094
下 篇 明清叙事思想若干核心概念研究	
第六章 作为首位和本源的文心	102
一、文心的思想渊源和文学理论化	103
二、明清叙事思想中的文心：以金圣叹的叙事思想为例	107
三、文心的多重结构意义探析：以金批本《水浒传》为例	112
第七章 结撰奇观的章法	116
一、章法思想的文学理论化	116
二、起结章法	118
三、遥对章法	124
四、板定章法	126
第八章 化工传神的笔法	128
一、笔、笔法、春秋笔法	128
二、明清叙事常用笔法探析	130
第九章 塑造风格维度的意象	135
一、意象在中国文论中的源流	136
二、明清叙事常用意象类型探析	138
第十章 刻画情感深度的“景/情”	146
一、从逼真到“景/情”二位一体	146

二、“景/情”二位一体与叙事的情感深度	148
结 语 强大的对立：中西叙事诗学分野的背后	153
一、神话与心志	155
二、重形式、重功能与重精神、重直觉	157
三、分析性、科学性与总体性、包容性	158
四、理性与关系性	159
汉英对照术语表	163
参考文献	173

导 论 中西叙事诗学比较：现状与展望

过去几十年以来，中国的叙事诗学^[1]研究吸引了国内外学者广泛的研究兴趣。综观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现状，此方面兴趣的增长或许有以下两个主要原因：①中国的叙事文学——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从质和量的角度衡量都是引人瞩目的，从而可以使中国古往今来的叙事诗学获得不言自明的合法性与解释力。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叙事思想宝库，并在当代西方叙事理论的参照下深入发掘其中的“瑰宝”，抑或“遗珠”。②西方经典叙事学固然体系完备、思虑精深，但在新的理论语境下却日益遭受各种质疑和挑战。概括而言，传统文论和修辞学者不满经典叙事学对于文本内的作者因素和修辞特征的忽视，后结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者则批评其囿于对文本内在结构的分析而未能体察文本以外复杂的政治和文化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叙事诗学的比较研究恰恰建立在结构主义方法的不足之上。对于结构主义文论的不足，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早在30年前便做出过经典的批判：

结构主义[……]撇开物质世界以求更好地说明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意识。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他相信意识从一层重要含义上讲是“实用性的”、与我们在现实中行动以及对现实采取行动的方式不可分隔地联系在一起，

[1] 西方在现代发展出了一门体系完备的叙事理论，亦可称之叙事学。而中国原生的叙事思想则散布于大量的古典文论或批评文献之中，长期缺乏理论的自觉。故而，本书借用更广义上的诗学一词以调和这两个比较的对象。还应说明的是，本书所指的叙事专限于以文学的形式或文字的媒介呈现的叙事。

那么结构主义这类方法注定是不攻自破的。这很像是为了更方便地检查某人的血液循环而先把他杀死。^[1]

（伊格尔顿，1996：130—131）

将结构主义的方法比作“为检查某人的血液循环而先把他杀死”未免有失公允，因为任何一门真正的理论在其肇始阶段都必须经历一个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所谓的“解剖”（anatomy）过程。然而，伊格尔顿的批评对于我们客观地反思经典叙事学可能的局限性仍然是有意义的。众所周知，结构主义的叙事研究方法在分析叙事的结构要素和原则时脱离了叙事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文化语境，从而有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出现某种程度的偏倚。如今，叙事学家已经普遍认同了语境在叙事批评和叙事理论建构方面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为了调和叙事研究方法中的经典与后经典之争，申丹（2005：142）指出“语境叙事学和形式叙事诗学在过去二十几年一直是互为依存的”。此外，结构主义的研究视角只聚焦文本的表层形式和深层规律性之间的关系，而对于叙事的创造和理解过程中一些微妙的相互作用则可能出现失察或者重视不够，比如：如何看待作者的“死亡”和/或回归问题，甚至莎士比亚意义上的作者“永生”^[2]问题？如何看待通过自己的选择、设计、价值和意图“诞生”其作品的那个人？如何理解存在于叙事作品中的激发情感的力量？作者——甚至也包括介入文本的批评家（比如中国古代的评点家）——创新体裁或文体时“破格”（一如文学研究常说的“诗人的破格”，poetic license）的限度究竟如何？是否存在游离于结构主义的叙事范畴分类以外的其他可能性？作者的文学才能或天赋如何决定一部作品的文学和美学成就？在叙事文本结构之外是否还可能隐藏某些重要的叙事信息？类似疑问不一而足。

中国传统的叙事思想则以自己的方式探讨了作者（权威）、文心、叙事技艺、

[1] 裘小龙、杨自伍译。伊格尔顿原文为：“Structuralism [...] spring from the ironic act of shutting out the material world in order the better to illuminate our consciousness of it. For anyone who believes that consciousness is in an important sense practical, inseparably bound up with the ways we act in and on reality, any such move is bound to be self-defeating. It is rather like killing a person in order to examine, more conveniently,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本书所有外文引文除有特别注明，均为本书作者翻译。

[2]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作有如下暗示：“Nor shall Death brag thou wanderest in his shade, / When in eternal lines to time thou growest: / So long as me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 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



叙事中的道德或哲学底蕴、宏观结构和超级结构、心理深度、混杂性与整一性、事件与非事件、真实与非真实等问题。相较于西方经典叙事学，或许可以归纳出以下三方面显著的不同：①不同于西方经典叙事学对结构要素和规律的条分缕析，中国传统的叙事思想尤其看重读者与叙事文本之间的互动，比如文学直觉、批判式（拘泥于细节，有时甚至是反复式的）阅读的快感以及审美过程的流动性和灵动性。有趣的是，这些特征也同样适用于中国艺术的其他门类，如诗歌、书法、绘画、园林艺术等。这或许与中国古代的文人传统或者士文化之间存在关联。②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似乎有一种经久不衰的对于叙事的社会历史意义的兴趣，这一方面导致作者热衷于元叙事的创作模式，另一方面导致读者/批评家乐此不疲地推求、还原和建构作者意图乃至可能的作者形象。毋庸置疑，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些杰出代表——例如《红楼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其结构和叙述多围绕关于社会生活或人生的某种哲学假定而展开。^[1]而且，历朝历代的批评家多陶醉于穿透文字的面纱揭示作者的某些人格特质。他们不仅着眼于字里行间的细微精妙之处，也关注在宏观结构和写作风格中暗含的未曾说出的信息（the inarticulate/ineffable）。^[2]③不同于西方经典叙事学创设了一整套批评术语，中国传统叙事思想对理论创新仅展现出一种相当保守的兴趣，多数情况下仅沿用或重新起用已有的批评术语，这些批评术语往往跨越不同文学体裁或艺术门类，其中许多还带有明显的隐喻色彩。

明清时期的叙事思想似乎贯串着一种看似自相矛盾、实则有意而为的策略，即一方面试图勾勒出叙事小说在体裁上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却又模糊其与其他文学体裁或艺术样式之间的界限。这一特点不仅见诸叙事话语（narrative discourse），也体现在批评话语（critical discourse）中。就叙事话语而言，中国古典小说虽然也将优先置于故事的讲述（storytelling），但同时却充当了多种其他体裁特征的一个“大熔炉”或者“共生场”，比如历史、神话、戏剧、街头说书艺术、诗歌以及多种样式的美文（belles-lettres）。这不仅丰富了中国人阅读古典小说时的文学体验，也在一定程

[1] 关于社会生活或人生有不同层面的假定。例如，在权力与秩序方面，《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采用了天下“治乱”、“分合”的假定；在道德人伦法则方面，《水浒传》采用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假定，《水浒传》和《金瓶梅》采用了“报应不爽”、“酒色财气，人之四恶”（以今天的标准显然颇有争议）等警世性质的假定；在人生虚妄的真相方面，《红楼梦》不仅着眼于一个“梦”字，更借用太虚幻境及其门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统全书之旨。

[2] 这种叙事和阐释传统与源自先秦的“春秋笔法”应当不无关系。一般认为孔子在编纂《春秋》时深谙“微言大义”的写作技艺，通过含蓄的语言和着墨的多寡巧妙地传递敏感的道义和历史评价信息。

度上塑造了中国人对于“奇书”或“才子书”的独特品味。在批评话语方面，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明清小说批评吸收了原本属于其他文学体裁或者艺术门类的术语，诸如戏剧、诗歌、绘画、书法、女红、园林建筑乃至风水等。“结构”（結構）一词本身便是很好的例子。“結”字蕴含着自然界的某些构造以及由之引申的某些创造性人类活动，而“構”字则更为生动地表明了结构与建筑及器物艺术之间的关联。再比如“章法”这个难以描述但却对叙事具有全局意义的术语，显然是借用自绘画和书法艺术，指艺术家为创造具有结构完整性和一致性的艺术作品对空间的配置和对节奏（时间）的控制。

基于以上几个显著特征，或许可以进一步做出两点归纳：首先，中国传统的叙事思想在重视叙事性（narrativity）和文学性（literariness）的同时也突显了作为“运用之妙”的“心”或者“文心”^[1]的重要性。后者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可以理解为能沟通不同艺术形式并且可以被理想作者、理想批评家和理想读者各自运用并在他们之间传递相同感受的一种认知功用。其次，中国传统的叙事思想发源于——并反过来强化了——一种特有的阅读习惯。在这种阅读习惯中，叙事的意义往往大于并且高于故事和情节，读者/批评家在打开书卷的同时便自然而然地踏上了两条阅读路径：一是对于作者这一迷思的证悟，一是对于其叙事的社会历史情形的推理和想象。^[2]中国传统叙事思想的这一方面与西方文学批评的“作者论”（auteur theory）以及后来的“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概念既具有相当的可比性，也存在颇有意义的差异性。下文另述。

中国传统叙事思想中这些独有的特点、范畴和经验可以为今天的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叙事研究带来新的启发。中西叙事诗学之间潜在的互补性增加了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借由比较，我们不仅可以描绘出一幅更加完整的叙事理论图景，更有助于构建一种能够体现日益增长的全球意识、适应变化中的世界叙事实践格局、更易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理解和接受的叙事理论。

过去几十年来，学界欣喜地看到，除了中国国内的文学研究者外，越来越多西方学者（其中一些具有中国背景）纷纷加入到这一极具挑战的学术领域。虽然他们中许多人的研究更多被定位在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甚至汉学领域，但客观上他们都

[1] 文心概念最早见于刘勰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

[2] 这两条分叉的路径固然有益于丰富文学想象，但在特定条件下也存在失控风险。中国文学史不乏这方面的沉重教训，从秦朝造成思想灾难的“焚书坑儒”到满清盛行的“文字狱”，等等。

为向西方学界介绍和阐述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中国叙事诗学体系做出了贡献。主要代表性人物包括浦安迪（Andrew H. Plaks）、陆大伟（David L. Rolston）、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刘若愚（James J.Y. Liu）、韩南（Patrick Hanan）、梅维恒（Victor H. Mair）、何谷理（Robert E. Hegel）、夏志清（C. T. Hsia）、余国藩（Anthony C. Yu）、张隆溪（Zhang Longxi）、芮效卫（David Roy）、白芝（Cyril Birch）、毕晓普（John Bishop）、蔡宗齐（Zong-qi Cai）、顾明栋（Ming Dong Gu）、卢晓鹏（Sheldon Hsiao-peng Lu）等。

然而，由于该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充分探索（尤其是被叙事学家），而且在方法上排斥共时性的（synchronic）比较（一方属于现代西方，而另一方属于古代中国），所以很难对主要的研究阶段和研究方向加以描述。在思索解决办法的过程中，本书作者受到了中西两方面的启示。首先是中国汉语中“借鉴”一词的形态和喻意，作者由此进而联想到美国文学批评家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广为人知的“镜”、“灯”隐喻。^[1]借用这两个隐喻，作者归纳出了“借异镜”、“磨己镜”和“亮交相辉映之灯”三种相互关联的研究方法，

一、借异镜与磨己镜

将这两种方法置于同一个标题之下是因为它们的发生过程几乎同步，后者的发生可以理解为对前者的动态回应。20世纪80年代，理论界渐渐吹起一股开放、活跃的新风，面对国内理论界长期断层的窘迫现实，“借异镜”成为一种客观需要，一场声势浩大的译介潮流在文学界和学术界展开。对西方叙事理论的译介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一个高潮，到那时西方经典叙事学几乎所有主要著作都有了中文译本（赵炎秋，2009：5）。在这些译介成果中，有两项时至今日依然不容忽视：一是张寅德先生编选的《叙述学研究》（本书又列入柳鸣九、罗新璋先生主编的“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一是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牵头编译的共计29册的“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本丛书包含了结构主义文论和叙事学若干重要著作）。进入

[1] 艾布拉姆斯在其重要著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运用这两个隐喻，既呼应叶芝的“the mirror turn lamp”诗行，也借以提炼出了柏拉图以后的古典主义文论和18世纪以后浪漫主义文论之间的本质区别。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学尤其是佛教亦常借“灯”指一种照亮有情众生生命之旅的智慧。

21世纪以来，对西方叙事理论的译介基本做到了紧跟最新发展动态。最主要的成果当推申丹教授主编的共含7部译著的“新叙事理论译丛”^[1]。除译著以外，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一批中国学者介绍或阐释西方叙事理论的专著，这方面又可以进一步分为：①多种版本的叙事学（或称“叙述学”）理论教程，例如罗钢的《叙事学导论》等；②一些探索理论前沿的学科交叉研究，例如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和《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董小英的《超语言学：叙事学的学理及理解的原理》、龙迪勇的《空间叙事学》、谭君强的《审美文化叙事学》、聂庆璞的《网络叙事学》等。过去30几年国内公开发表的有关叙事研究的学术论文更是难以计数。得益于“借异镜”带来的巨大推动效应，叙事学在中国的文学批评研究中越来越占据一个中心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借异镜”实际上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其中也包含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叙事诗学的理解和接受，虽然这个过程在规模和影响上远逊于中国对西方叙事学的学习和借鉴。上文列出的那些代表性的西方学者中至少两位是无论如何不容忽视的：宇文所安和陆大伟。宇文所安于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造诣之深在西方学者中堪称凤毛麟角。虽然他专擅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唐朝的诗歌，但他的学术兴趣和能力几乎涵盖中国古代各时各体的文学。在他的重要代表作《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一书中，他翻译并阐释了从孔子到叶燮（1627—1703）主要文论家的重要思想和论述。其中不乏一些对中国叙事具有强大解释力甚至对今天的叙事学研究也具有独特意义的理论名篇。例如文人皇帝曹丕所著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例，他提出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Owen, 1992: 65）所蕴含的气和体的区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文学的总体评价和寄予的精神追求，即文章中空灵和变化的东西（“气”）优先或者重于文章的形式属性（“体”）。曹丕对“体”这一概念的灵活运用^[2]也说明，在中国文论中，不同批评术语之间的“共鸣性”（resonance）或者“模糊性”（fuzziness）重于它们各自的“精确性”（precision）。而这正是中国诗学和西方文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再如，曹丕在该文中断言文章

[1] “新叙事理论译丛”200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包括米勒的《解读叙事》（申丹译）、赫尔曼的《新叙事学》（马海良译）、詹姆斯·费伦和彼得·J·拉比诺维茨的《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马海良、宁一中等译）、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陈永国译）、马克·柯里的《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苏珊·兰瑟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雅各布·卢特的《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徐强译）。

[2] 根据不同语境，曹丕所谓的“体”可以指代西方文论中区分的“形式”、“风格”或“结构”。